

Yearbook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年鉴

(2013)

赵明义 徐艳玲 蒋锐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年鉴 (2013)

赵明义 徐艳玲 蒋锐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年鉴·2013/赵明义,徐艳玲,蒋锐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607-5211-2

- I. ①社…
- II. ①赵…②徐…③蒋…
- III. ①社会主义—中国—2013—年鉴
- IV. ①D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2876 号

责任编辑:赵 岩 陈 珊 陈佳意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72.75 印张 1666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社会主义年鉴》编辑机构

顾问：

冷 溶 高 放 靳辉明 徐崇温 李崇富 黄宗良 肖 枫
李兴耕 奚广庆 闫志民 周尚文 徐世澄 蓝 瑛

编委会主任：

赵 曜

编委会副主任：

王建民 王经西 葛 荃 王韶兴 崔桂田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建嵘 王怀超 王学东 王建民 王经西 王韶兴 孔寒冰
包心鉴 白平浩 孙代尧 刘玉安 刘京希 许宝友 吕连仁
余金成 张光明 肖贵清 李景治 罗文东 季正聚 赵明义
赵 曜 周向军 胡振良 贾建芳 秦 宣 徐觉哉 徐艳玲
崔桂田 葛 荃 蒋 锐 鲁法芹 蒲国良 臧秀玲

主 编：

赵明义 徐艳玲(常务) 蒋 锐

编辑部主任：

蒋 锐(兼)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序)

牛凤燕 王四正 王彩霞 王增剑 王慧燕 王禧玉 白晓兰
田彤彤 成双凤 刘玉娣 刘 鑫 陈双荣 张孟琪 张 泰
李睿超 杨 德 孟凡玲 庞 睿 钟丽丽 姜其沅 郝 猛
郭士民 徐 尚 高建明 龚爱国 彭 云 傅雅蕾 蔡美玉

编辑单位：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前 言

赵明义

山东大学编写《社会主义年鉴》这件事，是2000年“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挂牌后不几年，在青岛召开学术年会时，该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赵曜同志提议、经全体学术委员认真讨论之后，决定由基地筹备编写年鉴。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迟迟下不了上马的决心。201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编纂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创刊号正式出版，他们敢字当头的精神大大鼓舞了我们；山东大学的领导暨社科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又使我们增强了编纂社会主义年鉴的决心。经过2011年和2012两年的筹备，通过编辑部全体成员的辛勤努力，由山东大学编纂的《社会主义年鉴》(2013)终于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年鉴启动之初，我们的目标是要编纂一部“像年鉴的比较好的年鉴”，现在，年鉴已正式出版，目标是否达到了？还是该年鉴首席顾问赵曜同志在其序言中说的好：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像年鉴的年鉴”，至于是不是好的年鉴，则请各位读者看官评判。赵曜同志认为我们这部年鉴“是像年鉴的年鉴”，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我们自知这部年鉴还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尚未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我们决心一年一年地编下去，努力争取每年都有提高和进步。

关于主编的事，我想在此说几句话。我作为一个82岁的老人，之所以又毛遂自荐出任年鉴主编，主要有这样几点考虑：一是想利用我小小的一点影响力推动年鉴下决心上马。二是我是个事业心较强的人，在有生之年还想创一点业，决心要把年鉴这件事办好。三是我之所以这样有信心，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我选中了徐艳玲、蒋锐这样能胜任年鉴主编的将才、帅才。徐艳玲为常务主编，蒋锐为主编和编辑部主任。两年来为完成年鉴创刊号的出版，他们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其辛苦难以想象。因为他们都是大忙人，不是专门做这一件事，而是在完成大量的教学、科研、行政和校内外学术活动之余完成这一任务的。徐艳玲任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校外还兼任一些学术职务；蒋锐任教授、博导、科社与共运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负责人、博士学位点统一战线二级学科负责人等。四是我们这个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团队有很好的传统：团结而不内耗，吃苦而不叫苦，相互尊重和关心。正是依靠这样的好传统好作风，我们这个编辑队伍才能在短时间内较好地完成了约170万字的年鉴创刊号任务。

《社会主义年鉴》(2013)各编研究述评、文献整理者如下：

2013年社会主义研究年度报告——徐艳玲、赵明义；

第一编——研究述评：鲁法芹。文献整理：徐艳玲、孟凡玲、姜其沅、蔡美玉、李睿超。

第二编——研究述评：徐艳玲、彭云、牛凤燕。文献整理：徐艳玲、彭云、成双凤、牛凤燕、姜其沅。

第三编——研究述评：崔桂田、刘玉娣。文献整理：崔桂田、刘玉娣、郝猛、傅雅蕾、张泰、杨德。

第四编——研究述评：蒋锐、王禧玉。文献整理：蒋锐、王增剑、高建明、刘鑫、王禧玉、徐尚、郭士民。

第五编——研究述评：蒋锐、钟丽丽。文献整理：蒋锐、王增剑、高建明、刘鑫、王禧玉、徐尚、郭士民。

第六编——研究述评：徐艳玲、庞睿。文献整理：徐艳玲、庞睿、王慧燕、白晓兰。

第七编——鲁法芹、田彤彤、张孟琪。

第八编——文献综述：鲁法芹。文献选编：蒋锐、徐尚、杨成果、陆轶之、刘春元、王建礼、钟丽丽、高峰、王禧玉、刘鑫、高建明。校对：钟丽丽、朱贵昌、龚爱国。

第九编——庞睿、彭云。

第十编——王彩霞、程荣。

附录——庞睿、彭云、李睿超。

本年鉴所选用的论文、著作、资料和数据都是公开出版发表在2013年报刊、书籍中的，我们对这些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年鉴的编纂得到诸位顾问、编委悉心的指导和支持，特别是首席顾问赵曜同志还亲自为该年鉴作序，我们深表敬意。年鉴的编撰出版得到校领导及社科管理部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出版社的物力、人力和智力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对于年鉴的编纂我们尽管已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不足和疏漏之处望读者谅解和批评指正。

2014年8月于山东大学

序 言

赵 曜

这部呈现在诸位面前的170万字的《社会主义年鉴》(2013)耗时一年多,其中凝聚着《年鉴》编辑部全体成员的辛劳和智慧。年鉴主编聘我为学术顾问,让我为本书作序。

人类最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恩格斯早在1874年就曾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诞生就存在了,但是把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大体上是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在我国首次把科学社会主义写进党章的总纲。总纲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进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指导下,为加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各级党校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少数高校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系或专业,编写各类社会主义教材,设置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位点,创办以社会主义为名称的杂志等等,但唯独缺少年鉴。因为编著年鉴,一要有充足经费,二要有编制和专业人员,此外耗时过多,负担太重。所以有些单位虽有意愿但轻易不敢上马。值得欣慰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敢字当头,两年前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发行后在学界反应良好。现在,山东大学即将出版的《社会主义年鉴》(2013)算是第二本。有两本年鉴比一本要好,因为各有特点和所长,可以比较借鉴,采长补短,共同提高。年鉴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是编者把这一年国内外报刊上所有权威性、代表性、前沿性的优秀作品和重要文献无代价地纳入书中,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这是任何报刊所不具备的。

我和山东大学有过一段接触,对山大有些了解。山东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有办好年鉴的一切必要条件: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山大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支可观的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学的师资队伍,改革开放以后将这支队伍集中起来创办了科学社会主义系,以后改为学院,至今在学院下仍设置科学社会主义系,队伍和实力未减反增,该专业在全国是唯一一所具有科社专业学士、硕士、博

士三位一体学位体系的高校,这与某些高校的校领导在市场经济条件只看眼前的学生分配需求,把原本强势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变成弱势学科,形成鲜明对照。在山东大学,历届领导都重视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把它作为学校的重点学科。山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在全国高校中是最强的,因而在教育部确立的当代社会主义基地的评选中荣登榜首当选,之后又被评为国家二级重点学科。二是师资队伍强大。山东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早已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老年以赵明义、胡瑾两位教授为代表。赵明义教授不仅长期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而且带出一大批优秀弟子。中年的代表有刘玉安、王韶兴、王建民、孔令栋、徐艳玲、蒋锐、杨鲁慧、周向军、方雷等,他们都是该学科自己培养的科社博士生,现在都已独当一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青年队伍则正在进一步加强。三是学科门类齐全。山东大学通过长期学科建设已形成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在内的学科群。四是聘请顾问咨询。山东大学为加强学科建设,从校外聘请了一些知名学者作为学术顾问。如,从中央编译局聘请的尹叙彝、李兴耕两位研究员就很有特色,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专业背景,又精通外语和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尹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默默无闻,潜心地从事科学研究,发表了很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译著,过去内部发行的《考茨基言论》《伯恩斯坦言论》《鲍威尔文选》《福尔马尔文选》等大多出自他的译著。在学界,人们发自内心真正钦佩和敬仰的就是尹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

据我所知,年鉴的最初酝酿是在2007年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在青岛召开的年度会议上,而正式启动则是在2013年。2013年6月7日,年鉴启动会议召开,正式通过了成立专门的《社会主义年鉴》编辑部的提议,明确了各编负责人和各自的职能分工。从编辑部成员的构成模式来看,形成了依托山东大学“一所两院”(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协同创新模式以及“老中青”三代阶梯形的人员配备,同时编辑部成员多元化的学科背景也有助于摘编观点时的多样化,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对于促进学术交流和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保证所搜集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编辑部还邀请本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编辑部的成员进行了文献检索方面的培训,特别侧重于网络学术资源库(如CNKI、万方数据库等)的检索技巧,从技术层面上保证检索的科学性、有效性。就本年鉴的特色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文献资料全面、翔实是本年鉴的一大特色。从体例上看,年鉴主体部分为六大专题: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研究;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研究;世界其他左翼政党、组织、思潮、运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对每一个专题,根据学界的关注点又作了进一步的细分。如在第二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专题下,将其进一步细分为总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研究。其中“五位一体”研究又进一步分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研究五大方面。作为一部工具性书籍,这种分类的方式方便了读者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和学术旨趣进行精细化查询,这种优势集中体现在年鉴的第九编。

二是新。所谓“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内容新。二是选取的文章观点具有创新性，主要集中体现在第一编到第六编。三是较之已有的本学科的年鉴，更加强调整体应有的工具性特点，而不是作为论文集的形式。这一特点体现在年鉴的第八编、第九编、第十编和附录部分。四是跟踪前沿，掌握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动态。这主要体现在年鉴的第七编上。

三是专。所谓“专”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年鉴体例安排上的规范性。一部合格的年鉴首先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编撰体例。这种合理性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科学性，即年鉴应当包含这一学科领域的全部研究范畴；二是可操作性，即要求年鉴编排在整体上具有统一性。这部年鉴前六编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囊括了社会主义学科领域的全部研究范畴，同时这种专题式的编排确保了年鉴形式上的统一性。从内容上看，每一编既具有独立性，同时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二是指所选编文献的代表性和专业性。每一编的论文、著译作、硕博士论文和海外论点都是精心选录，既有海内外的大家之作，也不乏青年学者的新颖之文。

年鉴初稿已完成。在我看来，这部《社会主义年鉴》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就学科领域自身的发展而言，希冀成为本学科联络国内外社会主义研究的力量，把本领域的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二是就其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而言，能够成为党和政府决策、政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相关学科教学、科研的重要信息源；三是就学科发展与大学未来建设目标的关系而言，着力打造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竞争力，为实现山东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贡献绵薄之力。

年鉴启动之初，主编曾提出，编辑部的同仁要做的是“一部像年鉴的比较好的年鉴”，如今这部年鉴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像年鉴的年鉴”，至于是不是好的年鉴，则请各位读者看官评判。

感谢主编让我为年鉴作序，并祝贺《社会主义年鉴》(2013)出版面世。

2014年7月写于北京

2013 年度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徐艳玲**

《社会主义年鉴》只有一个主概念,就是社会主义。根据一些中外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学者的考察,“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由拉丁文“社会的”这一形容词衍生出来的,系指一般称得上“社会的”学说。何时由谁首先使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一概念,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据《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社会大百科全书》第7卷说,汉斯·谟勒在其《社会主义一词及其同义词的起源和历史》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者”一词是安塞尔母·德生(1699~1772年)提出的。他将基督教学者和自然规律的现代倡导者区别开来,而把后者称为“社会主义者”。德国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运动史专家卡尔·格林贝格认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新词,是1803年意大利维琴察地区的传教士贾科莫·朱利阿尼在《驳斥反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朱利阿尼在该文中抨击了18世纪的个人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在肉体上、精神上、道德上的差别和不同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并把个人主义视为反社会主义。所以格林贝格认为,朱利阿尼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这一新词,但其词义与今天大不相同,仅在反对个人主义这一点上有些相似。英国的柯尔在其所著《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中也认为,这两个新词1803年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出版物中,可是当时的含义却同后来的不相干。英国学者马克斯·比尔在其所著《英国社会主义史》一书的“社会主义一词的来源”一节中则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7年11月底出版的正统欧文主义定期刊物《合作》杂志中第一次出现的。在该杂志第509页的脚注中写道:主张资本归公有的人就是公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932年2月13日,法国圣西门主义者戒西埃雷(H. Jonciepes,中文还有译为“乔西叶尔”的)在《世界》(又译为“地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雨果的《秋叶》的文章,文章也将个性与社会主义相对立。在他看来,个性就是个人主义,而社会主义一词则是指人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世界》杂志当时由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编辑,是圣西门派的主要刊物,该刊用社会主义一词来表述圣西门学说的特征。可见,“社会主义”一词最初是同个性或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发展到19世纪初便得到了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社会、经济、法律秩序的概念。当时西欧出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在世时从未使用过

* 篇首至第3页“主要目的是听取学界同仁的不同意见”和第5页“2013年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特点和亮点”至第9页“学界也发表了很多有关社会主义500年的重要学术论文”是赵明义主编修改时所增加的。

** 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社会主义”一词。欧文逝世较晚,到1840年之后,则正式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一词,在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时,就开始出现了。然而,“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则在287年(按1803年)至311年(按1827年)之后才正式诞生。

赋予社会主义概念以科学意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场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既指思想、理论、学说,又指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这三个方面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话,那就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或学说为指导,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学说,与共产主义含义相同。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出现,最早见于1842年12月15日马克思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文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提法。在这之后,马、恩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阐述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时,还使用过“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等提法。所有这些不同提法,都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或学说的,与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含义相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作为运动是指推翻资产阶级的旧政权和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旧关系的社会行动,与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含义相同。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这里的“社会主义”,就是指的推翻资产阶级旧政权和破坏资本主义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行为,也即社会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含义一致。在我国1981年前中译本马克思的著作中,一直未发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只是1875年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才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更高阶段。1981年,我国翻译了一个新材料,即1876年马克思修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约翰·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一书,在这本书中用过“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一概念。马克思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前提是工人有较高的需要。因此,它不能把工作日限定在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内。但是,在这里,生产者劳动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的高贵的游手好闲者。工作日将比现代社会中大大缩小,因为每一个劳动能力的人都将参加劳动,资本主义经济中那种不可避免的力量浪费将得以避免,并且随着工人全面增长,社会劳动生产率将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根据马克思在1875年所写《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就已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概念的这段话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但是这样一来就需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一直认定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的是列宁这一论断。因为列宁在1917年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中曾写

道：“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当然，这只是最近两年我反复思考研究之后的个人见解，而在这之前，在我的著作中还一直将马克思 1876 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含义视为与共产主义含义相同。现在将我的新想法在此说出，主要目的是听取学界同仁的不同意见。

《社会主义年鉴》所涉及的社会主义问题，不仅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来源——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运用和发展之后产生的本国化、本民族化的理论、运动和制度，而且包括世界上自称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理论、运动、流派、政党等等，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

2013 年，学界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六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民主主义，世界其他左翼政党、组织、思潮和运动和当代资本主义。从相关论文的检索数量来看，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相关论文最多，其次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二者成果数量相当，有关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民主主义、世界其他左翼政党、组织、思潮和运动的研究成果亦呈现上升趋势。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各部分除保持了对本领域一贯的主要议题进行更加富有深度的讨论外，还就 2013 年前后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展开了学理讨论和争鸣，诞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力作。

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和理论的研究。这一年共有相关学术论文 817 篇、著译作 80 本、硕博士论文 64 篇。这些成果包括理论和历史两大部分，理论方面学界集中讨论了科学社会主义直接思想理论来源——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列宁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其他社会主义代表性人物的社会主义思想等等。历史方面学界的研究侧重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东欧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等七个方面。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国际共运研究面临的困境和出路有了自己的思考。^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年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的检索表明，国外在这一论域的研究很少，而国内的研究成果颇丰。据统计，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论文有 2234 篇，著译作有 113 本，硕博士论文有 42 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术论文有 1285 篇，著译作有 177 本，硕博士论文有 155 篇。这些成果集中探讨的是：围绕着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及其相互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研究等方面展开研究。

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综观 2013 年，国内外学者对“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颇丰。从成果数量来看，与转型国家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学术文章有 64 篇，著译作有 10 本，博硕论文有 10 篇；与当

^① 孔寒冰：《国际共运研究的困境与出路》，载《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 3 期；《比较政治学中的国际共运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1 期。

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学术文章有 61 篇,著译作有 6 本,博硕论文有 24 篇;与发达国家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学术文章有 33 篇,著译作有 1 本,硕士论文有 5 篇;与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学术文章有 27 篇,硕士论文有 3 篇。从成果范围来看,涉及转型国家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当代国外执政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发达国家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四个部分。具体的研究议题包含两大方面:一是国外共产党的党史、党建研究;二是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研究。2013 年,共有相关学术论文 19 篇、著译作 5 本,硕博士论文 13 篇。从研究成果看分为两类:一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研究;二是以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模式研究。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学界主要围绕各国社会民主党困境时期的转型以及第三条道路的产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以及转型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而 21 世纪以后,尤其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学界开始注重讨论除第三条道路以外的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并积极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比较。

世界其他左翼政党、组织、思潮和运动研究。2013 年共有相关学术论文 71 篇、著译作 15 本、硕博士论文 39 篇。学界关于世界其他左翼政党、组织、思潮和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拉美左翼政党等方面。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2013 年共有相关学术论文 3585 篇、著译作 242 本、硕博士论文 653 篇。国内外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问题:一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二是关于后危机时代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研究;三是对资本主义其他热点问题的研究。

关于以上六个方面的详细内容,见《年鉴》第一至六编“研究述评”共约 14 万多字。此外,第七编“国内外学术动态”综述和第八编世界社会主义纲领性文献选编“文献综述”共约 6 万字。

2013 年,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特点和亮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从政治的高度、世界的视野、历史的源头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 500 年”,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一年元旦过后的第五天即 1 月 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了上述内容的重要讲话。他指出:“2012 年 11 月 17 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题进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我在学习时说,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年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31 个年头了。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研究和思考。今天,我想重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体会。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 500 年时间,这里,我想从 6 个时间段来看这个历史过程。第一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由来已久。1516 年,英国人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这本书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第二个时间

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个时间段,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第四个时间段,苏联模式逐步形成。第五个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第六个时间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之所以要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讲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讲起,就是要说明,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 90 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明白了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我们就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到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在这一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问题。他指出: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些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第二,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没有 1978 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如果没有 1949 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因此,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第三,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

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第四,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最后,习近平强调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于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讲话,新华社以新闻稿的名义进行了报道。这在国内外产生

了重大影响,在我国政界学界更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2013年5月6日起,北京卫视、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以冷溶为总顾问、闫志民为首席专家、崔耀中为总撰稿人的50集大型电视系列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随即发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纵横谈——从北京卫视播放〈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电视政论篇引出的话题》一文,划分并阐述了50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走过的四大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特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发表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海良等《关于社会主义500年回顾与反思的对话》一文,这一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名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读本》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两部重要著作正式出版。同时,学界也发表了很多有关社会主义500年的重要学术论文。

综观我们所编的《社会主义年鉴》(2013)所收进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著和资料,从这一年社会主义研究态势看还有以下问题需要陈述。

——从整体上看,从更多的纯学理探讨向更多的现实关照性转变。这从每编研究议题的选取和研究热点的变动趋势上即可看出。如第一编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理论部分,凸显了经典作家尤其是列宁的民主思想、党建思想、权力制衡思想、文化建设思想等的研究以及国际共运史上的民主实践,尤其是关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讨论。第二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部分,每一个学术研究的高峰,都与该段时期内召开的党代会(如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会”(如十二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出版的党和国家文献的汇编(如《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或者党政领导人的著作有着明显的相关性。第三编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部分,学者们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研究着墨最多。第四编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民主主义部分,研究的侧重转向探讨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注重进行系统地比较研究。第五编世界其他左翼政党、组织、思潮和运动部分,学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度持续上升,紧随其后的是对拉美左翼的研究热潮。第六编当代资本主义部分,学界则是通过一系列综述和研究报告等形式对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展开深度探讨。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对现实政治环境有着很强的敏感性和依赖性,这种敏感性和依赖性至少造成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这一学科领域开始更加敏锐地关注当下现实的政治问题,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时进行科学理性的学术探讨和解读,使得国家发展的蓝图更加趋于精细化、科学化,这是一种十分宝贵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成为了应景之作,仅仅是对中央提出的理论、政策的一种肤浅附和,缺乏学术探讨必要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这是需要引起学界同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文献内容上看,从更多的纯理论研究向更多的理论性和通俗性并存转变。如第二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点,一方面需要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使其得以形成理论自洽、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还需要进行理论宣传,这就需要对理论本身进行更为通俗化的释义,不仅是对普通群众也包含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从出版的著作来看,有很大一部分比重是针对党政干部的学习读物。这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此外,重复研究、各说各话现象亦不鲜见。典型诸如对苏联“亡党亡国”的研究,学者们从政治体制、党的建设、政党文化、官僚利益集团、经济体制改革等各方面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从这些视角进行研究,很难说是启自本年度的首创,但综观相关研究论文,几乎没有学者提及以往的研究成果。或许是学者独自思考的结果,但无视前人的劳动和付出,恐不是严谨的学者之所为,也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不利,更不利于年轻人迅速进入这个学科。又如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个老问题。2013年度,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质疑,但并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讨论和争鸣。当然,这些话题仍将会持续存在下去,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意见。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从单一狭窄的学术视野朝向多元交叉学科的广阔学术视野转变。如第三编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部分,既立足国内小环境,如冉刚的《古巴共产党:一切以“民心”为重》,又放眼国际大环境,如嵇明亮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非共对社会主义三大任务的新探索》;既有对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研究,又有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微观分析。第六编当代资本主义部分,国内外学者使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宗教学等等,并由此提出许多广受关注的理论成果,甚至有些学者建构了宏阔的理论体系,如海尔布隆纳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

——从研究方法来看,出现了较多的理论研究向较多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转变。如第三编国外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部分,既有横向的党际比较,如李黎的《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比较研究》,又有纵向的历史沿革分析,如成晓叶的《越南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沿革、现状分析及未来挑战》,还有直观的表格和图例,如赵婷、娄士强的《奥地利共产党的边缘化状态及其原因分析》。第四编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民主主义部分,开始初步系统地分析比较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从研究的力量构成来看,从较多的“单干”到较多的团队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转变。一方面,从研究的机构组成来看,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依托原有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所;二是依托本省的各类研究机构,进行资源整合;三是以本校的几个相关学院进行强强联合,如本年鉴的编写,是整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力量的结果;四是跨学校成立研究中心,如由北京大学牵头、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作为主要协同合作单位的协同创新机构——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新的研究机构的组建使得相对分散的学术资源得到有效的整合,从而为增强学术研究的整体实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以便进行协同创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从研究人员的构成来看,囊括了党政机关、各级党校、社会科学院所,高校社会学科和媒体精英。不同部门由于自身承担的不同社会功能,研究的侧重也有所差异。其中各级党政机关、党校、党报主要发挥理论宣传和普及职能,而各级社科院所、高校系统则兼具理论研究与宣传两个方面的功能。